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鄂温克族卷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鄂温克族卷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鄂温克族卷 / 中国作家协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63-7940-3

I. ①新… II. ①中…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鄂温克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3438号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鄂温克族卷

编者: 中国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那耘 李亚梓

特约编辑: 张绍锋 郑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469千

印 张: 28.7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40-3

定 价: 3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总 编 委 会

总 主 编：丹 增(藏族) 白庚胜(纳西族)

副总主编：包明德(蒙古族) 叶 梅(土家族) 乌热尔图(鄂温克族)

总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扎西达娃(藏族) 尹汉胤(满族) 阿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冯 艺(壮族)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 向本贵(苗族) 孙春平(满族) 吉狄马加(彝族) 阿扎提·苏里坦(维吾尔族) 阿 来(藏族) 李传锋(土家族) 张承志(回族) 杨继国(回族) 金学泉(朝鲜族) 和晓梅(纳西族) 南永前(朝鲜族) 赵剑平(仡佬族) 哥 布(哈尼族) 保伍拉且(彝族) 梅 卓(藏族) 朝戈金(蒙古族) 景 宜(白族) 鲁若迪基(普米族) 蔡测海(土家族) 潘 琦(仡佬族)

秘 书：张绍锋 郑 函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鄂温克族卷编委会

主 编：特·官布扎布

副主编：刘大先 锡林巴特尔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苏布道 苏伦高娃 赵富荣 斯日古冷

展示与起点

丹增 白庚胜

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正式推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这项工程得到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旨在按照党的文艺政策及民族工作总方针，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从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资助出版和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质量，繁荣民族文学创作，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佳作荟萃，群星璀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部分，我们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这是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和检阅，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盛事。这套丛书编选了各个少数民族各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集中展示了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景象，也拓展和扮靓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中华民族，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文明，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国文学，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各民族翻身解放，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共和国平等一员的 55 个少数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文学创作是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因而促使各民族的文

学也逐步走向发展、创新和繁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与多梯次的文学队伍正在壮大。目前，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作家协会都有了自己的会员。他们有的是本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有的是本民族作家群的代表，有的在国内和国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次入选的作品，是1976年至2011年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短诗等门类的佳作。长篇小说、长篇诗歌和长篇报告文学则暂列存目，适时另行选编出版。

从语种上看，入选的作品有直接用汉语言文字创造的，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原创后译成汉文的。由于历史文化与生产生活的演变，我国少数民族有的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的曾经有过但现在不再通用，有的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是由多重元素构成的，如语言文字、题材、主题、族属、审美心理、抒情方式、风俗画、风景画和哲学宗教理念等。所以，考查文学的民族性要综合多重进行，避免片面性和单一性。从入选的用汉语文创作的作品来看，他们同样表现了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写出了本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具有民族精神”。还有很多生动具体事例都证明了运用汉语言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同样可以创作出优秀的民族作品，同时表现出我们很少数民族作家深厚的汉语言修养与杰出的才智。所以，提倡学好汉语言、用好汉语言也是提高文学艺术质量所需要的。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来便于相互之间的沟通，增进相互的理解。另一方面，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博物馆。民族语言文字蕴含着民族心理的密码，承载着传统文化特有的审美方式。它在抒情表意方面，有些地方是极其微妙而难以取代的，况且，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牧区、林区或农区广大读者受众，还是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最熟悉、最有亲切感。所以，我们必须积极扶持民族语言的创作，发挥民族语言的优势，推动民族语言的创作。《民族文学》增设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五种文字版本便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在一个国家，有不同语言文字的创作，在一个民族也有不同语种的创作，这种差异更易于张扬文学自由和审美的效能，激活新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张力，更容易形成各个类型的作家之间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局面，以保持我国文学发展繁荣持续

性的活力，同时更好的保证众多读者多元性的审美需求。没有差异，不会前进；没有差异，不会多彩；不承认差异，不会有平等。肤浅的趋同论，是不科学的，是无益的。它的实质是单一论、终止论。这也是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演进发展所验证的道理。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为此民族所有，为他民族所无的优秀特质。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精神母体。文学的原创性和民族性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必须重视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另一方面，既然大家都有优秀的方面，自然也应该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这就决定了民族性的鲜明和稳定是与民族的狭隘保守性相悖的命题。民族文化的自信与书写、开掘与张扬，源于那些积极有价值的珍贵特质。这就要求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能以宽阔的胸怀和开放的态度，积极学习其他兄弟民族的优长之处，并敢于面对世界，积极进行共同交流，善于取长补短，反思追问，以民族的优秀传统为依托，创作出具有时代高度和国家情怀，能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作品。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都鲜明地体现着这样的文学品格。很多优秀作家也有这方面深切的感受和体验。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各少数民族的诗人对本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的描绘，对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感情的表达，对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诗歌形式的学习和创新，对珍贵诗歌艺术资源的借鉴和吸纳，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呈现丰富多样的风格与光彩。从诗歌的话语特征上看，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话语亮色。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全球文化的开放、冲撞和交流的时代。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们，继承传统，扎根本土，放开眼界吸纳有益的艺术元素，趋利避害自由地驰骋在时代拓宽的艺术空间中。由于政治性不再是文学创作单一的标准，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正放开更丰富的眼界，焕发更通达的灵性，使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彰显出更天然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时，随着世界视野的拓展，诸多带有人类性的艺术体验和诗歌题旨也自然成了少数民族诗歌的书写内容。除诗歌之外，我国少数民族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曾相对贫弱。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状态和语言等方面的影响，除若干人

口较多、语言文字成熟完整的民族外，很多少数民族曾经几乎没有小说等作品。建国后，随着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随着各民族之间广泛通畅的交流与互动，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快速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从边缘进入主流，成为中国文坛的亮丽风景，不仅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及“骏马奖”，有些还获得国际上的相关奖项，跻身于世界著名作家的行列。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根本保证，是国家在世界崛起的应有姿态。在这方面，文学应该走在前面积极发挥历史责任和主动精神。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并在各方面给予了特殊的扶持。1981年周扬同志就曾说过：“民族文学的书，民间文学的书，要适当多出版一些，现在还是太少”，“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文学艺术要发展，少数民族艺术也要发展”。特别是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刘云山同志明确提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时代要求。”1991年，赵朴初老先生在看到一篇关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章后，曾欣喜地赋诗一首：“出题能令亿民思，九派群科念在兹，功德日增凝聚力，灵根长发万年枝。”我们坚信，广大少数民族作家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与重托，将牢记使命和宗旨，以自己的勤奋与才华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是一个时期成果的展示，又是走向新征程的起点。对于这套丛书，我们坚持科学性、时代性和权威性的标准，怀着使之臻为典藏读本的愿望，进行了认真的组织、策划、编辑和出版。在此，谨向为此付出辛劳的各界朋友致以真诚的谢忱，并对我们的作者和译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2013年11月12日



序 一

乌热尔图

这是反映鄂温克民族生活的作品集。我记得，在 20 多年前，黑龙江省的学者曾撰写过一部《鄂温克族文学史》。在那部研究性专著中，重点分析的对象为鄂温克族的民间传说，因为在那一时期尚无一部完整的鄂温克族作品集问世，鄂温克族的文学创作队伍还未形成自己的阵容。如今，文学创作的态势让人感到几分欣喜，一支相对年轻的鄂温克族创作队伍初显英姿。

谈及这一话题，首先要涉及的是鄂温克民族的传统文化。应该说，千百年来，鄂温克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也有自己的一套传承方式。它明显带有“听觉文化”特征，那口口相传的多是鄂温克族古老的传说，其中包括鄂温克民族的起源信息，有部族早期大迁徙的“路线图”，也有鄂温克族先人尊崇、敬畏自然的规则与古训。毫无疑问，那是珍贵而厚重的文化宝库。

鄂温克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抢救与整理工作，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之后，一些专业与非专业人士，在时断时续地开展此项工作。他们勤勤恳恳，吃苦耐劳，置身于森林腹地、牧区草原，在第一线进行艰辛的田野调查。经过数十年的劳作，他们积累了一批用文字符号存留的宝贵资料。就是这些重要的文化资产，成为了构筑新兴的鄂温克族文学的基础。



从整体上看，当代鄂温克民族文学的破土萌生，与改革开放大潮的来临，与思想解放时期的到来，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鄂温克族的文学新人，以及反映鄂温克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陆陆续续地涌现出来，并得到了国内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得到了鄂温克民族整体的认可与支持。一支充满活力的鄂温克族文学创作生力军，活跃在了中国文坛。

在这里，需要思考的是，特色鲜明的鄂温克民族文学，对鄂温克民族的整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带来怎样的社会效应？又在哪些方面具有潜在的影响力？如果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就要对文学本身进行必要的价值评估。在我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者，是一位植根于故土的人，是敞开胸怀承接传统文化的人。无论他身居何处，都在眺望远方，是一位如饥似渴地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人。在他们身上凝聚的，应该是吸收与融合的能力，比较与批判的力量。他们能够凭借源自内心的想象之力，描画出一个族群的画像，并真实地表达其苦乐悲欢。就是那些轮廓清晰、性格突出的族群画像，经由文字符号的堆塑挺立了起来，变得可视可感，可亲可近，使本民族同胞有机会从中见识自己带着沧桑印记的尊容，也使陌生的读者能够近距离地触摸其肌肤，感受其喜怒哀乐，一窥那坚韧而和善的灵魂。简而言之，一个民族的文学所遵循和需要把握的，是那隐而不显的历史脉动，所记录的是日常生活中不该遗忘的一切，并为那压抑着的声音代言，为那些弱势的人群助力。也就是说，民族文学的基调，大多是在冷静地思考过去和现实，并乐观地展望未来。毫无疑问，一个民族的创作者，在舒展自身创作力的同时，要把一种精神的力量、文化的自信，传达给他所热爱的同胞。

我相信，读者将会在这部作品集中，找到自己的关注点，也会有自己的发现。这部作品集的问世，应归功于苏伦高娃、安娜、乌日娜、五一等同志，他们花费心思来筹划此事，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借此机会，也向他们表达我个人的敬意！



序 二

刘大先

能够得到信任编选这本鄂温克当代文学作品选集并为之写序，对我来说是项殊荣，同时也显示了鄂温克作家的宽广胸襟——因为很多族别文学选集的参与者和评判者往往都是标准的“族内人”，而我这样的汉族学者原本只不过是“外人”，似乎没有置喙的余地，但鄂温克作家愿意倾听“他者”的声音，也能够包容不同的观点，并不“躲进小楼成一统”。这可能是作为只有三万余人的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能够薪尽火传、赓续不绝的原因。

人数的多寡与文化的厚薄并无必然关系，正如经济的发达与否与道德修养的高低也没有因果链条，鄂温克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有着悠久口头传统的族群，一直没有书面文学，但一旦开始了当代文学的历程，便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她的作家用汉语、蒙语迅速创造了一系列精彩的篇章，并且产生了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影响力的领军性人物乌热尔图。

我最初接触鄂温克文学就是从乌热尔图开始的，早先读《七叉犄角的公鹿》，在台北和北京的几次会议上也遇到过，偶尔交谈，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后来系统重读他的系列作品，才发现经过时间的淘洗，在20世纪80年代风云变幻、杂花生树的文坛中勃然兴起又倏然而衰

的众多流派与作家中，乌热尔图反倒愈加凸显出鲜明的独特形象和文化意义。我曾经与几位做批评的朋友聊天说，当代文学在未来经过经典化后剩下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中，必然有乌热尔图一席之地。

但鄂温克文学并不仅仅止于乌热尔图，乌云达赉、涂志勇、杜梅、安娜、涂克冬·庆胜、阿日坤、道日娜、贺兴格、哈赫尔、武波远、尼玛官布、杜金善、柳华、杜刚、杜国良、白淑琴、古新军、敖蓉、德纯燕、德柯丽、娜仁托雅等老中青几代人的写作已经逐渐形成了鄂温克当代文学的总体脉络。按人口比例算，这样的写作人数是惊人的。当然，他们中许多人的写作尚处于比较草率和粗简的阶段。如果从“纯文学”或者审美、技法等角度去看，可能不值一提。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文学”从来就不能简单地化简成审美、娱乐的消遣，它也是教育和认识的途径、自我表达和张扬精神的渠道，更是凝聚族群、振奋精神的工具。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日常状态，所关心的事物，心里想要表达的欲望，情感诉求的倾向，内蕴丰厚的文化传统及对这种传统的自豪与珍重。我们读这样的作品，只要不带着惯有的审美惰性和思想偏见，都能从哪怕最简陋的文字中汲取到不可忽略的灵魂，就好像从表面充满杂质的原石中发现珍贵的白玉。

2013年，因为偶然的机缘，我到海拉尔的鄂温克自治旗的巴彦托海与辉河参加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三少数民族”笔会，第一次亲密接触到鄂温克同胞们和他们生活的地方。我看到湛蓝的天空、广阔的草原、笔直的道路和安详的人们，也见到日益增多的能源企业来挖掘煤矿、采集石油留下的机器和斑驳的地表。一切都已经表明，鄂温克这一个地处中国边疆、早先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族群日益面临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这种现代性的变革从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下山定居就开始了，在如今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新媒体时代愈加激烈。很大程度上，鄂温克的传统因为被迫卷入到这个全球性的现代进程之中。传统固然包含了生生不已、常变常新的一面，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却不得不在时势大于人的环境中各自面对这种命运，承受着变迁所带来的阵痛。

因而，从文学史上所谓的“新时期”以来，鄂温克文学第一波浪潮



直到当下，现代性中的内在冲突与裂变就是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它以两种形式被表述出来：在历时层面是传统与现代、代际之间的矛盾；在横向层面是族内共同体与外来者、地方性与全球性的扞格。这些作品往往在清新刚健中蕴含深沉广阔的思索。直到新世纪以来，这种现代性的失落依然是挥之不去的鄂温克写作主题，只不过它更增添了一种挽歌式的怀旧色彩和忧郁笔调。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强势进入，造成了执拗性的退守形态，使得越来越多的鄂温克新作家投入到对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强调之中，因为差异性才是应对全球通约性的资本和基点。但这无疑使得写作主题狭窄化和单一化了，文化寻根和认同的强势造成了更多可能性的压抑，让那些更富自我更新、自强不息的主题被掩盖。因为虽然是个边缘、边远、边境的少数民族，鄂温克始终都不是自外于主体、主流、主导性的文化与话语之外的，它的命运总是交织着大时代的变革。所有的忧伤与欢欣、哀愁与希冀、失落与梦想、迷惘与探索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涂志勇的小说《彩虹在远方》中可以读到类似“改革小说”式的困惑、挣扎、探索、创新的勇气与担当的精神。那是一种带有理性反思色彩的大写的主体在沉思自己及自己命运的命运。他的《最后的猎人》与杜拉尔·梅的《那尼汗的后裔》等则具有文化寻根的意味，一种新型的认同感开始展开，开始从本民族的渊深的传统里发掘资源，与乌热尔图中后期开始的非虚构写作转型齐头并进。这一切的文学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既是“鄂温克文学”，也是“中国文学”，更是“世界文学”，回响的是时代的跫音。在涂克冬·庆胜的自然主义色彩浓郁的故事白描中，在德纯燕“离散”式的写作题材中，也可以感受到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与心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鄂温克文学体现出来的宽厚博大、顽强坚韧、反求诸己、淳朴刚健精神，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一部分，讲述了一种不太为人所知的“中国故事”。这是鄂温克文学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普遍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鄂温克文学也有它的独特性的一面，即它们总是会带有天然亲近性的本族群文化书写，包括景物、住所、仪式、饮食、服饰、习



俗、信仰、禁忌等。这些描写不仅绘声绘色地提供了让人如深入其境的代入感，也是对于本族群文化的传播，对他人起到了认知和教育的功能。这是特有的、无法替代的新鲜特质。比如森林的场景和意象、猎人出猎的方法和过程、宗教活动中的萨满跳神……都增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组成和多样元素。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学书写中所保存的丰富的历史与情感信息，比如安娜《绿野深处的眷恋》就涉及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蒙古同胞收养3000多名上海、常州、苏州、无锡的孤儿的背景。在鄂温克牧民家中长大的上海孤儿铁木尔姑娘面临着类似于张贤亮的《灵与肉》中许灵均式的选择。这虽然是大时代的小插曲，却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还有《静谧的原野》中汉族知青李玉与鄂温克牧人桑登老爹、小妹妹塔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不正是中国各民族在交流互动中和谐共处的生动写照吗？但是，多年以来，这些历史，以我有限的观察，似乎只在内蒙古导演的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与电影《额吉》中有所体现。对于这样有着特殊意义的题材，他们是遗忘了，上海的作家、艺术家好像集体失语了。

文人的势利和世故，确实是我们时代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普遍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尽管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扶持，但是因为长久以来的文化惯习和“文明等级论”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少数民族“野蛮”、“没文化”，而是在既定教育系统中培育出来的批评者缺少知识储备和同情性的关怀。少数民族题材也往往缺乏商业性的价值，无法在市场上获得广泛的关注，所以它们难以赢得主流批评者、研究者的梳理与阐发，也很难作为一种国家性的文学知识进入到主流文学体系之中。然而，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足以自豪的文化经典，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大史诗（当然，我不怀疑很可能有许多作家、批评家压根连这些都不知道），也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著名和新锐作家，比如张承志、乌热尔图、阿来、阿拉提·阿斯木、叶尔克西·夏曼·蓝波安、瓦利斯·诺干、巴代、光盘、金仁顺、田耳、马金莲、了一容等。正是这些多民族作家的文学书写，反映了中国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中国文学生动的现场。在缺名少利的



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中，一般只有少数专门研究者去注意他们，并且还是集中在那些名家身上，鄂温克作家中被研究者注意和了解的更是屈指可数。所以，这本选集兼顾了许多并没有“名气”的作者，以及以蒙文写作的、几乎很少被汉语读者看到的作品，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呈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鄂温克文学创作的总体面貌。这同时也是呈现完整的中国文学地图的一种举措。

这里面的作品当然水平参差不齐，但从文学史料的角度来说，我们尽量力求全面，而不是以某种单一的审美标准做取舍。尽管如此，限于篇幅，还是必然要遗漏一些作品。它们散见于各种文学报刊，也可以见诸苏伦高娃编的《鄂温克族文学作品选》。如同前面所说，在回首往事、瞻望历史和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希望鄂温克文学能涌现出更多发挥想象、着眼未来、主动将自己个体及族群文化遗产融入更广阔的语境中进行思考的作品。毕竟，在这样的时代，需要主动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在关注本民族社会、生活、文化的同时，也努力在继承中有扬弃和超越。像那些文学先辈们一样志存高远，在一己的命运沉浮、悲欢离合中把握时代脉搏，脚踏草原大地，瞻望前行之路，毕竟每个人都命运相连。那些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的各民族同胞其实都在经历相似的命运。这本集子留下40多年来鄂温克文学的行进足迹，作为将来新作品出现的基础立此存照。

在此，感谢岱钦先生为鄂温克族作品翻译成汉文所付出的心血和智慧，把鄂温克民族独具的生产、生活、习俗方式呈献给读者。感谢鄂温克自治旗文联苏伦高娃主席及其同事们的大力协助和细致工作。他们的努力不仅在于为本民族留下一份文学遗产，也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事业提供一份见证。

2014年11月15日于北京八大处